9

Chinese Frontier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唐前南北文学地理研究的历史演进与思考

日本诗歌集锦《和汉朗咏集》与初唐诗流传情况

乾嘉“理必”与语言研究的科学属性

西部文学与“西部精神”

《呼啸山庄》的精神生态重审

夏承焘词学与《词学季刊》

夏承焘先生的读书札记

中文学术前沿

第九辑

《中文学术前沿》编辑委员会 编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Chinese Frontier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中文学术前沿

第九辑

《中文学术前沿》编辑委员会 编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文学术前沿．第9辑／《中文学术前沿》编辑委员会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10
ISBN 978-7-308-14922-8

Ⅰ.①中… Ⅱ.①中… Ⅲ.①社会科学—丛刊 Ⅳ.①C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68563号

中文学术前沿(第九辑)
《中文学术前沿》编辑委员会 编

责任编辑 宋旭华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387千
版 印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4922-8
定 价 5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0571—88925591；http://zjdxcbs.tmall.com

“古代文学研究的核心与边界、材料与问题”学术座谈会

座谈会场景

2014年11月28日下午2点，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教学主楼377中文系会议室举行学术访谈。浙江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周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方向王德华教授、唐宋文学方向胡可先教授和元明清文学方向周明初教授，以及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中心14位博士生和硕士生参加了座谈会。座谈会涉及问题颇为广泛，重点又集中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本位问题，跨学科问题，材料的发掘与利用以及研究过程中的问题意识等前沿问题，对于中文学术研究的推进和研究生培养都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座谈会人员合影

《中文学术前沿》编辑委员会

学 术 顾 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元骧　严家炎　吴元迈　吴熊和　裘锡圭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德华　方一新　池昌海　孙敏强　苏宏斌

李咏吟　吴　笛　吴秀明　汪维辉　张德明

周明初　胡可先　姚晓雷　徐　岱　徐　亮

黄　健　黄　擎　黄笑山　盘　剑　楼含松

主　　编:汪维辉

副 主 编:胡可先　吴　笛　黄笑山

本辑执行主编:胡可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文学地理研究

唐前南北文学地理研究的历史演进与思考 …… 王德华(1)
李益边塞诗及其对唐代中国北疆的书写 …… 高建新(30)
唐代南贬文人的物候与风土叙述 …… 张蜀蕙(43)

诗学研究

日本诗歌集锦《和汉朗咏集》与初唐诗流传情况 …… (日)长谷部刚(56)
韩愈“余事作诗人”之意探究 …… 林锦婷(63)
王士禛删订《十种唐诗选》版本研究 …… 杨　琼(77)

汉语言文字学研究

乾嘉“理必”与语言研究的科学属性 …… 冯胜利(89)
浦城临江方言古全浊入声读送气音的来历 …… (日)秋谷裕幸(108)
论朝鲜时代汉语教材中的特殊断句 …… (日)竹越孝(116)
姜亮夫先生汉字构造“七书说” …… 刘丽辉(123)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西部文学与“西部精神” …… 黄　健(133)
微博文学论析 …… 黄　擎　孟　瑞(141)

域外视野

《呼啸山庄》的精神生态重审 …… 吴梅芳(152)
作为文学理论家的肯尼思·伯克 …… 梁　晶(158)

学术访谈

古代文学研究的核心与边界、材料与问题 …… (162)

“人文学术大师活动周”特辑

夏承焘词学与《词学季刊》 …… 李剑亮(178)
夏承焘先生的读书札记 …… 吴 蓓(185)

[夏承焘先生的词学观笔谈]
从近代词学到当代词学的一座桥梁
——简论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 …… 沈松勤(195)
《唐宋词论丛》:词体内部特质的发掘 …… 胡可先(198)
夏承焘先生的填词实践与词学取径
——读《夏承焘词集·前言》 …… 陶 然(201)
《夏承焘日记》与夏先生的词学观 …… 楼 培(204)

“人文学术大师活动周:夏承焘”综述 …… 夏莉婷(210)

序跋书评

深刻立意与缜密思辨的偕行
——读《文艺批评话语研究:20世纪40—70年代》 …… 杨 艳(216)

唐前南北文学地理研究的历史演进与思考

王德华

内容摘要：传统时代对唐前南北文学差异的评价，主要是置于地域与文化双重维度共铸而成的北方文化中心论的视域下加以观照的。1840年以来，随着世界地理格局的形成，对南北文化与文学审视，逐渐走出了传统的和西方的地理决定论影响，对南北文学的差异，给予同等的各具特色的文化地理学的阐释。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中，唐前南北文学地理研究突破的重中之重，应是转向文学文本的地理空间研究，探求政治伦理、意识形态、情感审美等诸多因素对南北文学地理空间的型塑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接近南北文学的各自特色，发现南方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有地位与价值，揭示中国文化与文学南北二元共生、相互交融激荡、和而不同的发展历程。

关键词：唐前；北方中心；南北文学；地理观；空间

中国幅员辽阔，不论是从田野考古抑或是从传世文献来看，南北文化的差异及其交流融合始终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文化地理现象。南北文化不仅有其山川自然的不同而形成的自然地理特征，而且也包含着人文积淀，具有浓厚的地域人文色彩。南北文化差异说明了中国文化的二元特色，两种文化各自发展又交流融合，激荡相生，共铸了中国文化的重要底色。

传统社会与近代以来，学者对南北文化都高度关注。尤其是近代以来学术史与文学史论及南北差异，包含着以发展眼光全面认识中国文化的当下意识以及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情怀。从文学地理角度总结南北文学研究的历史进程以及所呈现的文学与文化地理观，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南北文学自身价值以及在批评与创作视域中南北文学价值的正负跌宕，而且也可以帮助处于全球化语境中的我们认识应以一种什么样的学术姿态，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文学中存在的南北文学差异问题。本文拟考察的唐前南北文学地理研究，主要是指作为相互对立依存的中国疆域上的南北两大地域文学差异及南北两大地域文学的交流与融合问题①。1840年鸦片战争，天朝为天下中心的封闭与自大的地理观念被打破，同时西学东渐，古老的中国也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本文以1840年为界，将这一历史进程分为两大历史时期。1840年以来，在170余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现代性进程总体上是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艰难地摸索前行。因而，本文以1919年、1949年为界，将这一历程分为三个阶段（1840—1919；1919—1949；1949年至今）加以论述，拟在传统与现代性视域的观照下，对唐前南北文学地理研究及文学地理观的演进做一粗浅的考察，并对存在的问题及寻求突破的途径，略陈一己之见，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传统时代北方文化中心视域下的唐前南北文学地理观

本文的“传统时代”是相较“现代性”而言的一个概念。从时代上讲，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

①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使用的文学概念不是纯文学的概念，而是大文学的概念，或广义的文学概念。

此前是传统的、专制皇权占主导地位的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传统时代,朝代虽经更迭,但是社会结构、政治伦理、主流意识形态都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北方文化中心"或"北方中心论",是一个包含地域与文化叠合的概念,它既是与"南方"相对的一个地域范围,同时它又包含着政治文化的内涵,即周秦汉三个历史时期定都北方所形成的政治权力中心以及强调夷夏之别的礼乐文明这一文化核心。"文学地理"①一词,梁启超始用之,但是古人对我们今天视作文学地理的研究对象早有关注,虽然大都是将其纳入文化地理、政治伦理的范围加以考量,呈现出浓厚的政教伦理色彩。此外,虽然传统时代没有"文学地理"这一概念,但是古代知识阶层的文化地理观以及由此形成的对文学地理的认知以及对唐前南北文学地理的评价,在文献编撰、文学评价以及京都与南北正闰认识上均有明显表现,且总体上呈现出北方中心论视域下的文化与文学地理观。

第一,就文献编纂而言,唐前产生了地域色彩相当明显的诗歌总集《诗经》,以及具有南方楚地文化色彩的《楚辞》。早在《诗经》时代,人们就有了地域区分意识。编纂十五国风,就反映出当时人们对区域政治与文化的关注。《诗经》十五国风的地域划分,地域不只是诸侯国概念上的代指,更多的是各国文化风俗场所的反映。《诗经》这种地域文学编纂对后来影响极大。《汉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汉志》)从三个视角述及地理:一是《禹贡》中的九州及五服;二是汉代的政区地理;三是先秦西汉的风俗地理。尤其是先秦西汉的风俗地理,在具体划分上,班固以先秦时的诸侯国为划分单位,并结合《诗经》,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区域地理沿革以及各地风俗。《汉志》对各地风俗的论述,其中区域是根据刘向的划分,其风俗是在朱赣撰述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由此可见,《诗经》地域编诗的方式及先秦各诸侯国的地域对后世论述古代风俗地理及文学地理的影响。而西汉刘向将屈原、宋玉、景差及汉人拟骚之作编纂成《楚辞》一书。两汉时称"楚辞"为赋或辞赋,很显然,"楚辞"是带有地域文化色彩的一种称谓。

此外,从文献编纂的取舍上看,《诗经》与《楚辞》反映了编撰者不同的地理观。如《诗经》中未录楚风,历代研究者作了多方阐释,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从楚国在周成王时封丹阳为子男之国起,楚人对周室分封不公就产生极大的对抗心理,并以"我蛮夷也"自居。因此,《诗经》没录楚风,反映了《诗经》时代的国家四方概念及夷夏之别的文化地理观,以及这一地理观在《诗经》文献编纂取舍方面的呈现。《楚辞》一书中屈原、宋玉与景差为楚人,收录的两汉作家有贾谊《惜誓》、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刘向《九叹》及王逸《九思》。从收录作品看,全为骚体;从作家本籍或活动地域看,淮南小山为淮南王门客,主要活动于寿春,严忌吴人,王褒蜀资中人,刘向沛人,王逸南郡宜城人。如果以战国时楚地范围来看,他们与楚地多有联系,或可皆划为楚人。而贾谊为洛阳人,东方朔为平原厌次人,二人均属于北方。但是贾谊《吊屈原赋》及《鹏鸟赋》均作于被贬长沙之时,故收录《楚辞》中的疑为贾谊所作的《惜誓》,或可以说与楚地也有着一定的关联。至于东方朔在历史上以滑稽形象示人,但是他的《答宾客》、《非有先生论》对处于大一统时代文士政治命运多有深切的感受与悲叹,因而身为北人的他,也可能没有贾谊那样到过南方的经历,但是他的《七谏》,在笔者看来,是汉人拟骚中最近屈原者。因而,《楚辞》这部书从编纂角度看,反映了刘向对"楚辞"地理的认知,即从源上讲,看到了"楚辞"的地域特征;从其流看,则反映了对"楚辞"风格特征的重视,超越了作家本籍与楚地的关系。《诗经》与《楚辞》两种编纂方式,可以看出,编纂者在人地关系、文本与作者本籍之间的看法有所不同,也反映了不同的文化地理观。《诗经》的地理观是以地域为主,其地理观静止而封闭;而《楚辞》则以文本为主,其地理观是

① "文学地理"一词,见于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1902)一文。梁氏所言"文学"包括"哲学"、"经学"、"佛学"、"词章"、"音乐美术"五个方面。

流动而开放的。这两种地理观对后世的影响都非常深远。就前者而言，产生了区域文学史研究，对一个地域的本籍作家或流域作家的研究，都是以相对的静止的地域范围作前提；而后者无论是在编纂文献或对地域诗派的划定与研究上都有影响。就编纂而言，刘向之后，如宋代晁补之《续楚辞》、朱熹《楚辞后语》等[①]，主要从作品思想情感与屈原切近者进行编纂的。而《楚辞》编纂呈现出的源于楚而又超越楚的以文本为中心的编纂方式，在后世诗派研究的界定上都能看到其作为源头的影响，如杨万里《江西宗派诗序》言："江西宗派诗者，诗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诗曰江西者何？系之也。系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②]"以味不以形也"，主要是强调江西诗派诗歌总体风貌上的相近，与刘向编定《楚辞》的宗旨一样，反映了以文本为中心看待地域文学的观点。同时这一视角，也涉及特定地域作品的传播问题。《诗经》与《楚辞》作为南北文学的代表，从文献编纂上看，也体现了两种不同思维方式。如果我们把《诗经》的编纂看作是国家意志的表现，那么，《楚辞》可以看作是个人整理的一个诗集。《诗经》体现出的国家形态下的区域文学特征与《楚辞》体现的由区域文学而向外传播扩散的文学地理特征，在最初的南北两部诗集编纂上得到了体现。其文献地理学的意义是应该值得我们关注的。

第二，从批评角度言，传统社会在地理与文本、人与地的关系上，一方面看到地理环境对一方风俗及作品风格形成的制约作用；另一方面因受到儒家思想等多方因素的影响，其地理观呈现出浓厚的政教伦理色彩，在唐前南北文化与文学的评价上表现尤显。如对《诗经》的评价，春秋时吴季札观乐，即由音乐而知各地风俗表现，《汉书·地理志》[③]以下一段则集中阐释了人地关系以及教化对移风易俗的重要性：

>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言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后王教成也。汉承百王之末。国土变改，民人迁徙，成帝时刘向略言其地分，丞相张禹使属颍川朱赣条其风俗，犹未宣究，故辑而论之，终其本末著于篇。

《汉志》对"风俗"作了地理学上的阐释，如果说"风"着重于地理环境，即"水土之风气"；那么，"俗"则是一地的好恶风尚。在人地的关系上看到二者的互动，但更趋向于"圣王在上，统理人伦"的教化作用。《汉志》在具体分析区域风俗形成原因时，主要从自然环境、经济结构、人口迁徙、文化传承及教化这四个方面加以论述，若综合来看，《汉志》很明显地表现出"重北轻南"的特点。

首先，从自然地理环境来看，《汉志》非常关注地理因素对风俗的影响，如言楚地：

> 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火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呰窳偷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

此段述及楚地自然经济状态对民风的影响，所谓地广物饶，食物常足，故而"呰窳偷生"，"不忧冻饿"，勾勒出楚地自给自足，但民无发奋图强之精神状态。《左传》中记载，"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以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儆之于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训之以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

---

① 按：这种编纂体例一直影响到当代。如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重印说明"中言《绍骚隅录》，"著录历代摹拟《离骚》著作的篇名和汇集的书名，以见屈原赋对后世的影响。共著录书籍十九种，篇章一百九十二题"。崔富章师《楚辞书目五种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编写说明"中言《绍骚隅录》在姜先生的基础上，又新增四十种。

② 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3230 页。

③ 本文所引《汉书·地理志》，见中华书局 1974 年点校本，第 1525—1674 页。

匮'"[①]。显然《汉志》并没有采纳《左传》中的记载。且出土文献显示的楚民族创造的物质与精神文化,日益证明了楚民族并非是一个不善于创造与进取的民族。后世学者或囿于这种地理风俗记载,而将南方楚民族想象成非常落后的蛮族,不能不说与班固的这一记载的传播有关。其次,强调历史文化传承对一方风俗影响,固然这是研究区域文化特征的一个重要视角,但是综观《汉志》,对受到先王圣贤遗风教化的区域特别关注,如秦、中原、齐、鲁之地。如言秦地:"故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昔后稷封黍,公刘处豳,大王徙岐,文王作酆,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又言:"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吴札观乐,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旧乎?'" 而对楚国则简叙其历史,风俗方面突出强调其非理性的一面,即"信巫鬼,重淫祀",对楚族在春秋时期君臣上下励精图治的精神避而不论。最后,过多地强调儒家文化化行不良风俗的作用,如文翁化蜀,班固引孔子"有教无类"赞之。楚自春秋以来,拓土开边,但《汉志》在叙述过程中,对楚文化影响只是着重于对南方吴越与巴蜀的影响,对邻近的陈、宋文化影响避而不言,反映出夷夏之防。对长期以来形成的南方文化落后的观点,李学勤曾提出疑问:"长江流域,特别是其中下游地区,物产丰饶,土地肥沃,交通便利,为什么落后于黄河流域,没有孕育出绚丽的文明来?难道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形成发展中,长江地区长期处于落后的被开发的态势,真像有人说的,直到六朝,甚至宋代,南方才成为较发达的区域吗?传说北宋晚年,邵雍在洛阳桥上听见杜鹃啼声,预言南人北上,那时南方的力量才开始进入历史舞台的中心,这当然是偏见。"李先生并从历史发展与文化的角度指出这一偏见产生的重要原因:"到东周时期,王室衰落,强调'尊王攘夷'之论,荆楚吴越等国才被摈弃为化外,在华夏与蛮夷之间,划下了严格的文化界限。"[②]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汉志》中以单一的儒家文化衡量评判一地风俗的地域文化偏见。

以上就班固《汉书·地理志》透露出的重北轻南现象而言,若就南北两大地域来看,传统社会对南北文学的认知与评价,大都是在北方文化中心这一视角下进行观照,明显带有政教伦理的色彩。如对屈原骚体中诸多想象空间及书写,不论褒贬,多以儒家思想作为论断的标准。如班固言其"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对此,王逸的反驳也是引用经典,所谓"登昆仑而涉流沙,则《禹贡》之敷土也"[③]。刘勰对前代褒贬任声的批评,也以经典为标准,析出屈作合于经典与未合经典之处。刘勰虽然推崇屈原骚体,特撰"文之枢纽"《辨骚》一篇,但是对屈原骚体的地域因素,却简单以"江山之助"论之。朱熹《楚辞集注》云:"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原之为书,其辞旨虽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然皆生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虽其不知学于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驰骋于变《风》、变《雅》之末流,以故醇儒庄士或羞称之。"[④]批评屈原"不知学于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反映了朱子以北方文化为中心的地域意识与文化偏见,主要继承了孟子的言论。这种地域文化偏见,在历史地理研究方面也有反映。如清代顾栋高在《春秋大事年表》中曾提出"春秋时楚境不过江南说",但是考古的不断开展、地下文物的不断出现,证明顾氏之说的武断。以上均反映了传统时代对屈原骚体创作褒贬任声背后所共有的北方文化中心的文化地理观。

同样,六朝文学,其精神气象虽不能与屈原相比,然就创作而论,正如学界所达成的共识,南朝

①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宣公十二年,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31页。

② 李学勤主编:《长江文化史·序言》,江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

③ 以上引班固、王逸言,见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9—50页。

④ 朱熹:《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文学对北朝文学及唐代文学均产生深远的影响；但在文学批评上，从南北朝始，无论南方抑或北方对南朝过于追求形式的文风都有所批评。周勋初曾论梁代文论三派，除趋新派外，保守派如裴子野、折中派如刘勰等，都常以儒家诗教对时风进行批评或纠偏。《隋书·文学传序》[①]叙述汉魏以来文学变迁，言："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对南北文学的不同特色作了概括，且以儒家文质彬彬之说以取南北文风之长加以融会贯通，虽然有着辩证与历史的逻辑，对南朝文学也指出其合理的一面，但是对梁大同以后的文风则做了严厉批评，言："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将南朝大同以后文风等同于亡国之音。可以说，经由南北朝至唐初对南朝文风的批评，南朝文风与南方地域相联，成为吟咏性情、讲究形式的代指，并超越了地域，与郑卫之音一样，成为侈靡文风的象征。这一观念甚至影响到宋明以后，如明代李东阳力矫台阁体之弊，认为文风的衰弱，与地理习俗密切相关：

> 文章固关气运，亦系于习尚。周、召二南，王、豳、曹、卫诸风，商、周、鲁三颂，皆北方之诗。汉、魏、西晋亦然。唐之盛时，称作家在选列者，大抵多秦、晋之人也。盖周以诗教民，而唐以诗取士，畿甸之地，王化所先，文轨车书所聚，虽欲其不能，不可得也。荆楚之音，圣人不录，实以要荒之故。六朝所制，则出于偏安僭据之域，君子固有讥焉。然则东南之以文著者，亦鲜矣。本朝定都北方，乃为统一之盛，历百有余年之久。然文章多出东南，能诗之士，莫吴越著若者，而西北固鲜其人，何哉？无亦科目不以取、郡县不以荐之故欤？[②]

李东阳对当朝定都北方一百余年来，文章多出东南的现状颇为不满，并将此状况归为"科目不以取、郡县不以荐"的制度原因，这种认识反映了李东阳有着北方优于南方的地域观，故其所谓"荆楚之音，圣人不录，实以要荒之故。六朝所制，则出于偏安僭据之域，君子固有讥焉"，对"荆楚之音"和"六朝所制"的文学，则以"要荒之故"、"偏安僭据之域"加以贬低。这种地域歧视的文风定性与指称，正反映了传统社会根深蒂固的北方文化中心论对南文与北文的批评共塑。批评的背后隐藏着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对南北地域空间的话语移植，从而使南方地域与南方文学成为与北方相对的具有意识形态隐喻的地理空间。

第三，从京都与南北正闰问题上看，都城是政治文化的中心，政治权力所在，皇权与天下中心的象征。西周宗法社会所形成的以洛阳为中心的天下意识，是北方文化的重要内涵，并构成地域与政权合法性叠合的现实意义。其影响所及，不论是在大一统时代建都之争，还是在魏晋南北朝分裂时期南北政权正闰即孰是正统的争论上都有明显地表现。

于省吾《释中国》，根据1963年陕西宝鸡出土的何尊铭文及《尚书·梓材》，指出"中国这一名称起源于(周)武王时期"，并认为"甲骨文之言四土和四方，均以大邑商为中心言之，西周时代才进一步以中土与四外方国对称"[③]。武王灭商后就开始着意于东都洛邑的营建，《逸周书·作雒》曰："周公敬念于后曰，予畏周室不延，俾中天下。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④]武王卒后，周公

---

① 本文所引《隋书·文学传序》，见中华书局点校本1973年版，第1729—1730页。

② 李东阳：《麓堂诗话》，《历代诗话统编》(三)，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876—877页。

③ 于省吾：《释中国》，见胡晓明、傅杰主编：《释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6、1617页。

④ 黄淮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24—525页。按："予畏周室不延"，《逸周书汇校集校》作"予畏周室克追"。汇校引王念孙案语云："《初学记·居处部》引此本作'予畏周室不延'，延误为追，后人因改为克追耳。"又引唐大沛云："当作'周室不延'。延是国祚长久之意，正与'敬念于后'意相应，王(念孙)说是也。"今从之。

继之,“作大邑成周于土中”,目的是为了使周朝国祚长久,使东都洛阳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汉书·地理志》言:“昔周公营洛邑,以为在于土中,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师。”[①]将中土与四方联系起来,更加明确地说明了洛邑居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以及“诸侯蕃屏四方”的政治意义。很明显,西周初年营建洛邑,具有地域及政治文化的双重内涵,其中国四方的天下观念具有明显的地缘政治色彩,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汉大一统时代一都长安,一都洛阳。刘邦采娄敬之言定都长安,一方面有形便之考虑,另一方面也有着西周旧都的文化支撑。东汉前期(光武、明帝及章帝)三朝,一直存在着迁都与反迁都的争论,这一争论在章帝时期得到基本解决。如果说光武帝刘秀在东汉建立之初,尚要两都兼顾,那么,明帝则通过云龙门对策,通过讨论司马迁与司马相如优劣的方式,提倡文士“颂述汉德”。而撰就于章帝时的以班固、傅毅、崔骃等为代表的京都题材的赋作,主要以洛阳为天下中心的地理优势以及儒家“仁者无敌”、“仁者无疆”的文化地理观,颂美东都洛阳。此外撰就于汉章帝时的《白虎通》,阐释了洛阳的地理文化价值;而崔骃的《四巡颂》则是反映了汉章帝以洛阳为中心巡视四方的地理政治实践[②]。可以说,周秦汉长安与洛阳二都东西辉映,共同塑染了北方文化中心论的政治与权力色彩。但是在接踵而至的将近四百年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除去西晋有短暂的统一,这一时期是南北分裂。三国鼎立时,魏、蜀、吴三国存在着正统之争,对各自政权的合法性,都从地域与文化角度加以论证。如魏文帝黄初四年(223),魏大臣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尚书令陈群、太史令许芝、谒者仆射诸葛璋各有书与诸葛亮,陈天命人事,欲使蜀汉举国称藩。诸葛亮作了一篇《正议》,表达了他的观点:正统地位并不在于是否“处华夏”,而在于“据正道”,即诸葛亮所谓“正议”之正也,同时文中指斥了曹魏禅让的虚伪矫饰[③]。西晋前期的傅玄(217—278),卒于晋武帝咸宁四年,灭吴前二年。他写过一篇《正都赋》,此赋虽已残,但肯定写于吴亡前。如果说前引诸葛亮《正议》之“正”强调的是“据道之正”与蜀汉正统,那么,我们可以推测傅玄之《正都》之“正”,应是从都城的角度强调的是居天下之正,即“处华夏”之正,所包含的内容应与皇甫谧《三都赋序》言左思创作《三都赋》“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意同。值得注意的是,曹魏与西晋,虽然都定都于洛阳,但是左思《三都赋》并没有给洛阳以重要的位置,而是将曹魏陪都之一的邺都作为重要的描写对象,与蜀都成都及吴都建康,鼎足而三 ,构成了左思笔下的三都赋,并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洛下的效应。这一变化,一方面因魏都属于北方文化范围,相对于西蜀与东吴仍然占据文化地理的优势;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西晋较为普遍的“晋承魏统”的正统观[④]。从三国东吴始,尤其是随着东晋衣冠南渡,北方中心的地缘政治优势的丧失,使得僻处建康的六朝,朝野上下都在试图消除“即土洛中”的地缘政治色彩,而采用望气这种占星、祥瑞等术数方技手段,论证六朝建都金陵的地缘性与政权的合法性[⑤]。在史学领域,习凿齿一反晋承魏统,著《汉晋春秋》,强调晋承汉统,也有着以文化代替地域以论正统的取向。在文学创作中,郭璞《江赋》是最具地缘政治色彩的赋作。《文选·江赋》李善注引《晋中兴书》言“璞以中兴,王宅江外,乃著《江赋》,述川渎之美”[⑥],也简明指出了郭璞创作《江赋》的地缘政治背景。《江赋》描写了长江水域自然与人文景观,

①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50页。

② 详参拙文《东汉前期京都赋创作政治背景及时间考论》(《文学遗产》2008年第2期)、《东汉前期赋颂二体的互渗与散体大赋的走向》(《文学遗产》2004年第4期)。

③ 《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引《诸葛亮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18—919页。

④ 详参拙文《左思〈三都赋〉邺都的选择与描写——兼论洛阳纸贵的历史与政治背景》,《浙江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⑤ 详参孙英刚:《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第二章《“黄旗紫盖”与“帝出乎震”:中古时代术数语境下的政权对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⑥ 《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83页。

并在“上善若水”的文化观照下，表达对东晋王朝乐道法水的期盼以及“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的中兴期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郭璞为了突出长江水域的重要地位，作了一些夸张与不合实际的描写。如对长江起源的看法，《江赋》云“惟岷山之导江，初发源乎濊觞”，尊崇《禹贡》“岷山导江”之说，以岷山为江水发源之处。中国科学院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注言：“据谭其骧考证，两汉和六朝人士已知金沙江源流很长。汉书地理志：‘越巂郡遂久县，绳水出徼外，东至僰道入江。’水经注卷三十七：‘绳水出徼外，……至大莋，与若水合，自下亦通谓之绳水矣。’遂久在今云南永胜县北，绳水即金沙江，僰道即四川宜宾，大莋在四川会理西，若水即雅砻江。由此可见，在汉朝和六朝时人们已知金沙江的上游远在永胜和会理以西。明史地理志和其他记载也都指出金沙江的上游远在云南丽江以北。”[①]班固在郭璞前，郦道元在郭璞后，以郭璞丰富的地理知识，不会不知“岷山导江”说的不确，但《江赋》开篇引用《禹贡》观点，有引经自重的用意，以此提高江水的地位。另外，《江赋》中长江水域范围要广于实际地理范围。《江赋》中言江水：“总括汉泗，兼包淮湘，并吞沅澧，汲引沮漳”，又言：“滴汗六州之域，经营炎景之外。所以作限于华裔，壮天地之险介。”钱锺书《管锥篇》论及“郭璞《江赋》无实”时，引姚旅《露书》评此赋“总括淮泗，兼包淮湘”句云：“江与淮泗，沓不相涉，何尝包括？又江只跨梁、荆、扬三州，无所谓‘六州’，亦不注于五湖也。”[②]指出《江赋》描写不实。从实际地理状态看，确实如此，但是郭璞知识丰富，又从河内南下，中经江淮，对长江、淮河水系应有所了解，实际上不应有如此错误。与郭璞采用“岷山导江”说一样，郭璞描写长江水域，并不是出于地理描述，而是基于文学创作，这就决定了作品中存在的“不实”描写。郭璞无外乎意欲扩大长江水域的经流范围，尽可能地让长江水域作为华夏主体部分而存在，以便为东晋立国江南提供地域上的文化支持。由此可见，对于南迁的东晋政权，一方面他们不得不面临与消除传统北方文化中心与僻处江南之间的地理错位；另一方面，又可见出南迁政权以文化正统自居来强化僻处江南政权的中心地位，改变了以往北方中心文化与地理合一的思维定势。与此相对的北方诸国，却以处于中原正统自居，如魏收《为侯景叛移梁朝文》言：“夫化成万物，分界九道，纪之以山河，照之以日月，方足圆首，含气呈形，咸总之于圣人，毕会之以朝市。皇魏应衔甲之秘图，纳封金之宝命，万方为宅，四海为家，卜世灵长，将逾八百，天壤之间，朝不别焉，唯夫三江五湖，九蛮百濮，其地如掌，人鸟未分，瞻星昧环拱之方，托水迷朝宗之义，积蝇为众，长蛇称长，石田无菽粟之用，众人非声教所孚。是以年历三伪，弃而不有，岂力不足，盖所未徵，而陆梁涂泥，时轶疆鄙，天讨所遗，理存恶杀。”[③]完全承袭了北方中心的文化地理观并对南方作出了蛮夷的地域定位与描摹。李延寿《北史·序传》言其父：“大师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④]由此可见，唐前统一与分裂状态下对京都及南北地域的观照，始终是在文化视域下进行的。北方文化不仅是一与南方文化相对的区域文化概念，而且在长期的文化积淀中，这一概念已然超越地理，具有正统文化资格并成为个体与政权的身份象征。六朝南北分裂打破了此前政权、文化与地域的一致，这一时期政权与地域、文化与地域的错位给南北地理带来的文化定位，对后世影响都是巨大的。如唐皇甫湜《东晋元魏正闰论》言：“往之著书者，有帝元，今之为录者，皆闰晋，可谓失之远矣。或曰：元之所居，中国也。对曰：所以为中国者，以礼义也；所以为夷狄者，无礼义也，岂系于地哉？”[⑤]显然承继《春秋》的夷夏之辨，以文化别正闰，而非以地也。而北宋

① 《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编辑，学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28－129 页。

② 钱锺书：《管锥篇》第四册，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1235 页。

③ 《文苑英华》卷六五〇，中华书局 1966 年版，第 3344 页。

④ 《北史》卷一百《序传》，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3343 页。

⑤ 《皇甫持正集》卷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张正平《南北正闰论》则与皇甫湜相反:"夫晋之渡江也,遗中服之雅俗,据吴人之旧土。齐梁之后,风教荡然,危弱相承,礼刑不立。五代四姓,浸微以灭,上无所授 ,下无所归,虽欲正之,人谁适从?……魏氏先实漠北,控弓朔代,南平燕赵,遂通秦凉。出令作法,变风迁俗,天地有奉,生人有庇,且居先王之位,宪先王之国,子先王之人也……前世大儒断南北之疑者,所以正魏也。"[①]则以地理为先,同时兼顾文化。唐以后治史者对三国魏与蜀、东晋与北魏孰是正统的争议,主要是因六朝地理与文化的错位、后代王朝统绪与历史衔接等矛盾所造成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夷狄与中原的矛盾、华夏与南方的错位,是传统时代六朝南北正闰之争关键。南北正闰之争实乃拆裂了北方文化中心论所包含的地域与文化的一统,各自所持依据实乃北方文化中心一端而已,都未脱离北方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二、1840—1919:天下中心的打破与唐前南北文学地理研究

毋庸讳言,中国现代化进程开启的被迫性,无论是在科技层面抑或是社会与人文思想的建构等诸多方面,都受到西学的影响。近代以来的地理学研究不同于传统地理学之处,在于地理学"放眼看世界"的世界地理格局的形成。1840 年左右林则徐辑译英国慕瑞《世界地理大全》为《四洲志》,1842 年魏源在此基础上撰成五十卷本《海国图志》,此后学界开始撰述世界地理,倡导地理学之教育,从地理角度探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文学,成为一种风气。中国为天下中心的地理观被打破,世界地理观的建立,为近现代文学地理研究的现代转向,提供了迥异于传统的文化地理背景。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以来的地理学有着中国与西方的东西文明比较以及本国内的南北文化差异比较的两大主题。世界地理格局的背景,势必对唐前南北文学的评价带来新的影响。从 1840 年至 1919 年,在南北地理与文明演进以及唐前南北文学地理差异的研究上,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从地理观上看,受到传统与西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在地理与学术及文学的关系上,过多地强调地理环境的重要作用,并将南北地理与文明、文学的演进联系起来考察。如梁启超在 1902 年发表的《中国地理大势论》、《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亚洲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等文章,《梁启超文集》编者对《中国地理大势论》作了如下说明:"本文原刊 1902 年 4 月—6 月《新民丛刊》第 6、8、9 号,署名'中国之新民'……此文发表后,作者所撰《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亚洲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亦曾在《新民丛刊》刊出,分别介绍了西方及日本有关文化地理学的理论与著述。与诸文以撮述为主不同,本文属于创作。作者尝试用新绍介之新学说研究中国地理对文化的影响关系,为此后刘师培之《南北学派不同论》、钱基博之《中国舆地大势论》等文开了先声。"[②]以上诸文,从东西地理比较,梁启超一方面认为地理环境决定了文明的兴衰;另一方面又认为西方目前的文明是中国文明刺激了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加倍反哺中国的结果,此最体现了时人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即希望师其所长,又对西方地理环境决定论对中国民族的歧视加以反驳的民族自尊心理。正是在这样微妙的关系中,从地理角度探讨中国古老文明为何发展缓慢、探讨中国文化发展的出路,也就促成了时人对中国地理与文明关系的重新审视,并集中体现在南北文化差异的论述中。

梁启超认为文明的发生与河流关系密切,他将中国主要地区分为中、南、北三大流域,即北部

① 《乐全集》卷十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926 页。下引梁启超文,版本同,不复出注。

的黄河流域，中部的扬子江流域及南部的西江流域。这三个流域在时空两个方面体现了中国文明的演进：

> 自周之前，以黄河流域为全国之代表；自汉以后，以黄河、扬子江两流域为全国代表；近百年来，以黄河、扬子江、西江三流域为全国之代表。穹古之事不可纪，今后之事犹未来。然则过去历史之大部分，实不外黄河、扬子江两民族竞争之舞台也。前者西江未发达，故通称中部为南部。数千年南北相竞之大势，即中国历史之荣光，亦中国地理之骨相也。（《中国地理大势论》）

此论实紧承魏源《海国图志》的观点，魏源《海国图志后叙》中言："岂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欤？"[①]梁氏在此基础上，论述了中国地理与文明的关系与发展，其实就是南北地理与文化竞争大势，之所以列出西江，实借此指出文明发展之地域流向。历时地看，梁氏认为"大抵中国地理开化之次第，自北而南。三代以前，河北极盛；秦汉之间，移于河南，浸移于江北；六朝以后，江南亦骎骎代兴焉。而自汉迄今，全史之大部分，皆演于江河间之原野"。梁启超的观点很显然有着西学东渐的学术背景，同时也有着当时南方为发起革命之地的现实与地理原因，很明显地带有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色彩。此外，刘师培《攘书》(1904)及《南北学派不同论》[②](1905)，也表现出与梁氏共同的中国地理与文明发展之间关联的观点，并在南北地理差异视域下，将中国古代学派析为南北两派，认为学派之异，全由地理。1906 年王国维发表《屈子文学之精神》[③]一文，在具体论述屈子文学之精神前，王氏也提出了中国南北两派论。可以看到，以梁、刘、王为代表的地理与文明及文学的关系的论述，虽或有异，但是从南北地理视角考察文明、文化及文学演进，则是共同的思维路径。

第二，对先秦时南北学术与思想作了南北两派的划分，共同表现出北方尚实、南方崇虚的总体地域文化判断，明显地呈现出北学胜于南学的文化地理观。时人非常重视中国学术源头诸子学的研究，从地理角度强调诸子南北学术或学派的不同，成为一种风尚。如梁启超《中国地理发展大势》(1902)及《论中国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均有论及，而《论中国思想变迁之大势》尤详。首先，与他的中国地理与文明的总体判断一致，认为凡文明之起必依河流，中国的黄河、长江正是孕育南北文明之河。梁氏将先秦诸子学派分为南北两派，并十分强调地理环境对诸子及南北文学之精神的影响：

> 北地苦寒硗瘠，谋生不易，其民族销磨精神日力以奔走衣食，维持社会，犹恐不给，无余裕以驰骛于玄妙之哲理，故其学术思想，常务实际，切人事，贵力行，重经验，而修身齐家治国利群之道术，最发达焉。惟然，故重家族，以族长制度为政治之本，敬老年，尊先祖，随而崇古之念重，保守之情深，排外之力强。则古昔，称先王；内其国，外夷狄；重礼文，系亲爱；守法律，畏天命：此北学之精神也。
>
> 南地则反是。其气候和，其土地饶，其谋生易，其民族不必惟一身一家之饱暖是忧，故常达观于世界以外。初而轻世，既而玩世，既而厌世。不屑屑于实际，故不重礼法，不拘拘于经验，故不崇先王。又其发达较迟，中原之人常鄙夷之，谓之蛮野，故其对于北方学派，有鄙弃之意，有破坏之心。探玄理，出世界，齐物我，平阶级，轻私爱，厌繁文，明自然，顺本性：此南学之精神也。

---

① 《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71 页。

② 本文引用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见万仕国辑校：《仪征刘申叔遗书》，广陵书社 2014 年版，第 1611—1656 页。

③ 本文所引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见《王国维文选》，林文光选编，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7—30 页。

这里梁氏阐述了南北地理不同对社会制度、经济、民俗以及学术文化的影响,显然是对《汉书·地理志》风俗地理观的承继。其次,就南北思想而论,梁氏认为"北派支流多而面目各完,南派支流少而体段未具。固由北地文明之起先于南,亦缘当时载籍所传,北详南略,故南人之理想,残缺散佚而不可观者,尚多多也"。同时也指出南北两派的对立,即"又其发达较迟,中原之人,常鄙夷之,谓之蛮野,故其对于北方学派,有鄙弃之意,有破坏之心"。最后,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梁氏意识到了战国末期南北各家各派的融合问题,即"列国之国势,楚、齐、秦三分而终并于秦;思想之大势,亦楚、齐、秦鼎立而汇合于秦"。梁氏将从黄帝至于晚清的中国学术划分八个时期。以春秋末为界,前此为胚胎时期,而春秋末至战国为中国学术思想的全盛时期。而全盛时期又分为四期,即第一期南北两派;第二期孔学老学墨学三宗;第三期儒墨名法阴阳道家六家;第四期是儒墨名法阴阳道杂七家分裂混合时期。梁氏详细地分析了全盛时代第四期学界分裂混合大势,有四现象:一曰内分、二曰外布、三曰出入、四曰旁罗。这四现象揭示了"北、南、东、西四文明,愈接愈厉,至是几将合一炉而冶之"。从梁氏分期及论述,我们不难看到,梁氏的眼光还是看到了最初地域及不相杂厕的南北思想汇合于秦的发展大势,可以看到1920年后梁氏转向探讨人地辩证关系,在这里已显端倪[①]。此后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中《南北诸子学之不同》(1905)、王国维《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1904)及《中国哲学史》中《孔子之学说》(1907)等文,对先秦时南北学术与思想的论述均与梁氏基本一致。

第三,主要从文学的角度,对以《诗经》与《楚辞》为代表的诗歌,作了南北文化地理视域下的比较。对屈原骚体融合南北文化的特征的评价,明显地呈现出南北文化差异的文化底色,即北方文化发展先于南方文化的这种地理与文明演进的历史地理观。如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云:"屈原,文豪也,然其感情之渊微,设辞之瑰伟,亦我国思想界中一异彩也。屈原以悲闵之极,不徒厌今而欲反之古也,乃直厌俗而游于天。……南人开化,后于北人,进化之迹,历历可征也。屈原生于贵族,故其国家观念之强盛,与立身行己之端严,颇近北派;至其学术思想,纯乎为南风也。"梁氏认为屈原对楚国的热爱以及立身行己,属于北派;其所谓的屈原学术思想,也就是他所认为的厌世思想,代表屈原思想的南方特色。在梁氏看来,屈原思想及其骚体是由南北文化共塑而成的,所以梁氏把屈原定为南派的别支。

刘师培于《南北学派不同论》(1905)中特设《南北文学不同论》一节,对南北文风差异,完全从地理角度论之:

> 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际,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尚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

此由地理论及风俗再论及文体与文风,将地、人与文看作是一个生态场域,而认为地理对人与文起到决定性的影响。由于地理原因,北人尚实际,南人慕虚无;北文重事析理,南文重言志抒情[②]。唯《诗》"区判北、南,《雅》、《颂》之诗起于岐、丰;而《国风》十五,太师所采,亦得之河、济之间

① 1920年代以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史学观的改变,梁启超在人与地、地理与历史的关系上逐渐走出20世纪初的相对单一的视角,如他在《地理与年代》(1922)中即强调地理对人类之影响随着文明的提高其力愈薄,故亦强调人类心力的重要作用。《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1924)一文也反映了梁氏将地理与历史、时间与空间结合起来打破单一的地理决定论的改变。虽然梁氏的这种改变,并没有使他对唐前尤其是先秦时代的南北学术与文风的看法带来太大的变化。

② 刘师培论及先秦文学除诗骚外,尚有文与辞赋。文章方面,刘氏认为,先秦时,文章北有谨严简直之文如《尚书》与《春秋》,辞约平易如《礼》、《乐》二经,《大易》为析理之作。诸子北有孔子、孟子、荀卿、吕不韦、韩非之文,南有老子、庄子、列子、纵横之文。辞赋,北有荀卿,南有屈、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